



重要言论

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密联系实际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定“四个自信”，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

何毅亭

话语权，是国之重器。大国复兴，话语不能缺席。

强大话语往往背靠强大国家。古往今来，中心国家的话语在每一时代都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雄踞世界之巅的位置，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从汉唐盛世直至康乾盛世，中国的农耕文明历经千年进化，达到辉煌的极致。因此，中国古典话语，以其璀璨的内涵、深沉的智慧和优雅的姿态，辐射四方。近则泽被四邻，新罗和高丽、日本、琉球、越南及东南亚诸国，世受风华濡染；远则播及世界，在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等遥远的地方，引起一阵阵文化激动。中华古典话语从古而今未曾断裂，“中华文化圈”成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婆罗门教文化圈交相辉映的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备受景仰。

话语衰落往往源于国家衰落。近代以来，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社会制度形态变迁，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不可避免地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侵蚀、所取代、所超越。体现在国力竞争与国家地位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不仅因为落后而挨打，也因为落后而失语进而挨骂。而与此同时，西方话语上升为世界的主导话语，以其强势占领了文化高地，掌握了话语内容的定义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话语争议的裁判权。西方或以布道师身份出场，将地域性话语上升为普及性话语，谋求殖民于世界；或以裁判者面貌出现，以西方是非为标准，对其他国家的话语、行为乃至世界观、价值观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伴随着西方话语汹涌而至，中华古

典话语被迫挤入历史暗角，失去了本来的荣光。

话语复兴寄希望于民族复兴，话语复兴也始于民族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件，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一个历史性伟大开端，也是中国话语在20世纪中叶走向世界的开始。像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就是当年中国话语对世界的贡献。

68年，弹指一挥间。今日之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在时隔几个世纪之后，终于站在了民族复兴的门槛上；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已然成为21世纪最为确定的历史大趋势。现在的中国，“物质上的强大”正在成为现实，但这绝不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全部梦想，中国绝不能成为一个物质发达而精神贫困的“跛脚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一个政治经济强大的中国必然是精神文化同样甚至更加强大的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复兴，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得到了大幅提升，开始与国力相匹配并相互促进。在APEC峰会、G20峰会、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举动牵动世界目光，低迷的全球经济、失调的全球治理无不期盼中国方案。中国没有让世界失望，而是交出了亮丽答卷。如今的中国，不仅事实上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推动者、引领者，更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层面上重构了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形态，让世界重新理解全球化、重新拥抱全球化。当联合国、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

制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无不期待听到中国声音时，中国亦大度分享自己的智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文明多样性，从合作共赢到包容互鉴，中国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充满希望的新图景。

当然我们也有短板。在“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但我们的短板不在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而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自觉与自信相对不足方面，在于我们把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相对滞后方面，在于对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准备不足等方面。

比如，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疆拓土阶段，当然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不屑一顾，甚至我们自己一度也对自己的文化文明产生怀疑。但是当今天的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天人合一”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药；当今天的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与冲突而你死我活、战火纷飞时，“和而不同”恐怕是实现各得其所的唯一选择。所以，不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不好，不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已经过时，而是我们没有发掘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那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宝藏，没有把它用现代社会能接受、能理解、能认同的话语表达讲清楚说明白。

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由于欧美自以为是地秉持西方中心论立场，必然不可能对非西方发展道路、非西方文化价值观抱有同情的理解和善意的认同。所以，尽管我们通过走自己的路取得了超越西方的发展奇迹，这一点西方社会已无法否认、也不再闭

起眼睛简单否认，但中西社会之间在制度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话语鸿沟仍然非常大。我们不能指望让西方人来客观描绘中国，也不能指望用西方话语来准确阐述中国。曾经一段时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比较惨痛教训的。明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发展奇迹，可是由于西方理论不能有效解释，被一些人扣上“不合格”的帽子；明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让中国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可是由于与西方民主形式不一致，同样被一些人视为“专制”，等等。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通过构建中国学派来解读中国实践、彰显中国价值，是中国话语复兴的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样宏大的事业，靠少数几个人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靠一两个学科单兵突进也是不可能的，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勠力同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协同共进，聚集起磅礴的伟力，形成导向明确的态势。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的成功实践已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国道路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发展的问

题，而且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and 办法；中国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了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集体自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了话语建设的着力点，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不再奉西方话语为圭臬。再就是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地期待来自中国的声音，愿意下功夫通过掌握

中国概念来理解中国逻辑，不再简单地套用西方概念来比附。从去年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他们的会议文件，传递出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号。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话语在21世纪复兴充满信心、很有底气，还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本身就包含了一整套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表述。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包括“中国梦”、“一带一路”、“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标识性概念，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话语场的核心议题和基本共识。

这里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中国话语的复兴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励精图治、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党心军心民心。如今，民族复兴的路线图已经绘就，中华民族已经阔步行进在通往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中国话语复兴自然有了坚实的基础。

展望整个21世纪，世界上最成功的样本毫无疑问是中国，最精彩的景观毫无疑问在中国，解释这个样本的中国话语毫无疑问就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话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治理优势最终转化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优势。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计日可期。

中国是行动的巨人，也终将成为话语的强者。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面貌新境界

编者按：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学习时报特开设“砥砺奋进的五年——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解析”专栏，刊发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系列文章，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和认识。

□ 刘海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无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心词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叶，现在已发展到21世纪；产生在资本主义的欧洲，今天已扎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正脉和主流。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有这份自信。

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在世界范围内，21世纪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运动的发展态势。但是，其他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在逻辑上都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与之始终保持一致则值得研究，不宜轻信。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则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品质，二者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围绕“人类解放”这一主题而展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明地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

时代，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基础上发现了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并设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作为“初心”，通过革命的实践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同时，又遵循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推进这个伟大事业的进程中，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了崭新的面貌和深刻的内涵。

——四个自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同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这说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更加自觉。自信，来源于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考察，来源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来源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支撑。我们党从深深刻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问题意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对我国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的回应，因此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依然存在。透过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立足这个最大实际，我们党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

径，即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将其视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战略布局。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

——发展理念。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广义上是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狭义上特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发展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既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又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反映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价值追求。

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所在。现代化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据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工业社会是发展的样板，资本主义是发展的道路，任何偏离这条道路的做法都被理解为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仅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50美元增长到7000多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78年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

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0%多。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由3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典范。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还有更宽广的道路等待着人们去探索，中国方案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而且必定还会使中国方案更加完善。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党性原则，这就是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必然呈现出新的发展。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无产阶级仍然作为“世界历史”存在，“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和消失。与此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民族的差异、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等因素，共产党在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作为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首先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然后才属于“全世界无产者”范畴；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在表达全人类利益的同时，首先要表达本民族和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从“国别史”的角度看，工人阶级政党首先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根据本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表达；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

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应以此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本期导读

党章为何规定义务先于权利

党章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并把党员义务规定在先，权利规定在后。这种规定顺序，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员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和自愿性，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摆正了党员

详见5版

可燃冰的前生与来世

详见3版

藏书大家郑振铎

详见7版

砥砺奋进的五年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解析